

关键的十年

THE CRITICAL DECADE



努·纳扎尔巴耶夫 著
NURSULTAN NAZARBAYEV

民族出版社

本书由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资助出版

关键的十年

THE CRITICAL DECADE

努·纳扎尔巴耶夫 著
NURSULTAN NAZARBAYEV

曹特金 李巍岷 康春林 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键的十年 / (哈)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著; 曹特金,
李巍岷, 康春林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ISBN 7-105-06218-5

I. 关... II. ①哈... ②曹... ③李... ④康...

III. ①国际问题—研究②社会问题—研究—哈萨克斯坦

IV. ①D815②D73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528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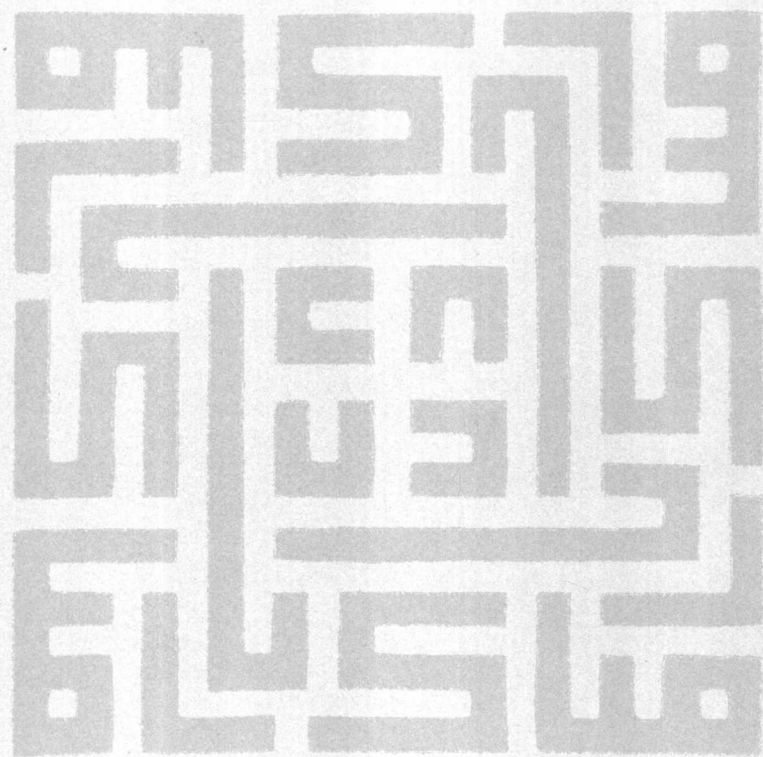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7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5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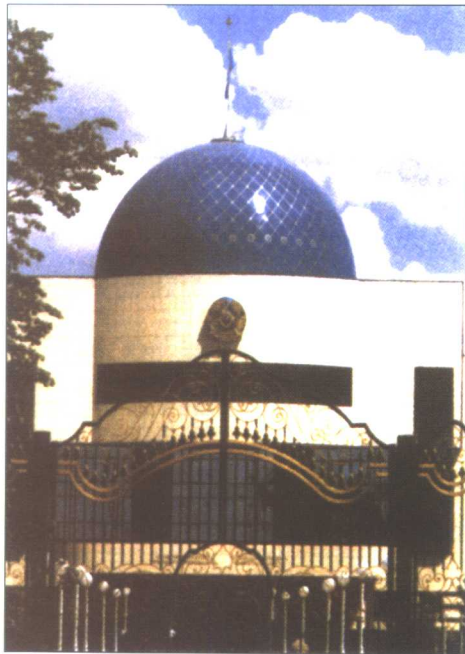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对外合作部电话: 64284112;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一个封闭的社会——只有在笼子里飞翔的可能性，尽管这个笼子很大很大。一个开放的社会——具有在天空中飞翔的可能性。与我们的历史和自由意志相适应，我们更接近于后一种比喻——一只翱翔在阳光明媚的辽阔草原上空的雄鹰……







火的记忆（序言）

一束束眩眼的白色火花从浓密的烟尘中穿出，有如向四周喷射的焰火一样。我习惯地用铁钎打开炼铁炉的出铁口。这时就像太阳光突然透过密集而滚动的云层射到我的身上似的。这种液态的金属从出铁口挣脱出来，像一股耀眼的铁流，沿着排铁槽急速地向前流去，溅射出闪亮的喷泉般的火星，被烤热的空气直接打到我的脸上。热浪是如此之大，以致在这种时候眼睛里会有意无意地流出眼泪，短时间内会因空气不足而感到呼吸困难。

还在不久以前，也就在 30 年以前，我作为一个新手站在燃烧着熊熊烈火和金属的大炼铁炉前，或者在震耳欲聋的轧钢机旁工作。一种不可克服的强烈愿望支配着我：要挣脱出去，到广漠的大草原上使人精神焕发的新鲜空气中去；去重新感受针茅的香味和黄昏前大平原迷人的寂静。特别不能忘怀的是每一个新手都会存在某种恐惧感：当你离上千度的炽热的金属洪流只有几米远；当你的不小心的动作和每个复杂的冶金过程，还包括不可预测的技术失误，都会抵消这个距离。

对比和比喻并不总是合适的，通常是主观的……但是，类比终究会甚至无意识地支配我们：火的性质和力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不管这是熔炼金属的高炉或转炉，还是另一种属性的火——人的激情的破坏性地爆发。这种激情，当人们不能控制和支配它们时，就会变成破坏性的力量和灾难。

只有最严格和完全地遵守复杂的技术过程的所有环节才可以保障炼铁炉

的安全。可惜，在人的相互关系中，却缺乏可以消除破坏性后果的足够严格的规则。

伟大的哈萨克思想家阿拜（Abay）曾经说过：“仇恨——不是对真理的捍卫，而是忌妒，或者就是不会在和谐中生活。”很难说，在我们地球上发生的那些政治或社会问题的真正原因中，有多大程度上存在忌妒的因素。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不同地区激化或暴发的许多冲突和矛盾，其基础都离不开起码的“不会在和谐中生活”。确切些说，是不会保证和谐，以及没有足够的自信去达成和平协议。不会在和谐中生活或不自信的正是那些当事人。

在当代史上，有很多紧密的日程表。过去长达几个世纪和几十年的事，现在只在一瞬间就可完成。当今，国家元首们和总统们每天见面，而在过去即使相邻国家的统治者们也从不相见，或者只在下述情况下相见，即这种相见意味着某种统治或某个国家的更迭。今天，新的国家和联盟几乎每个月都有诞生，而它们要获得最终的结构形成、站稳脚跟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种种现象，不论是股票指数的狂跌，还是地区性的重大事件，在全球以如此快的速度到处闪现，以致可以说，现在已到了承认人类有一个统一的中央神经系统的时候了。正像哲学家们说的，今天我们可以将在空间争取到的东西在时间上消耗掉。事件和过程的万花筒是以如此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变换着，以致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仔细地观察和思考各个地区和社会的个别细节。

形象地说，世界和世界秩序的景象变换得如此之快，以致艺术家和鉴别专家来不及给它们涂上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色彩。而为了扩大这个调色板，就不得不使用新的婉转语和新词。在这些新词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是——全球化和国际恐怖主义。

对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新的巴比伦。它使各民族更加分离，并在自己的废墟上把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埋葬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某种统一的新理论场。它可以把所有力量联合起来，并顾及这些力量所反映的各种社

会的社会文化利益和各种国家共同体的利益。

对全球化的反对者来说，这至多不过是一些老现象的新称呼：新殖民主义、新西方化、新现代化。

全球化的支持者列举了重要的论据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正是全球化促进了以前落后地区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重大进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证据系统和自己的一套论据，但真理通常只在其中的某个地方。全球化确实把一些民族赶进“石器时代”，而用自己的生命力和持续的繁荣使另一些民族富裕起来。

至于全球化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进入我们的生活，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对和谐与安宁的自觉的和本能的愿望。许多方面，即使不是全部，是取决于其他的、不可觉察的因素——文化潜力、历史传统、经济状况、资源基础……个人的或民族的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这些感受和理解并不是有时候都符合逻辑的或建立在建设性的基础上的。

这也牵涉到所谓的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这些词汇急切地和生硬地闯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国际用语。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最极端的表现是：世界共同体肌体上的慢性病。这些病是由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染上的。不能说，这种病的地缘政治症状比社会症状多。不能说，它的经济起因大于公民不服从或政治抗议行动。或者说，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理由。在这里，存在各方面的原因是符合规律的。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就是战争。就像在任何战争中一样，我们，作为反恐怖主义联盟的成员和抱有善良愿望的国家，也不得不应用武器。但不消除下述损害民族和国家的许多现象就不可能消除恐怖主义：富裕世界和贫穷世界之间灾难性的深渊；一方面是和平宣言，一方面又是武器供应；利用地球上数百万人对毒品的依赖性而获得巨额钱财的可能性；地

缘政治的野心和私利主义。

但是武器，即便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在这里也无济于事。当我们在沉迷于反对恐怖主义斗争并把一些国家和民族赶进“石器时代”的时候，我们只能经常地使“恐怖主义”这个概念流行起来，却不能使它消失。

只有懂得“国际恐怖主义”不是独立的现象，而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可见的一角时，我们才能不只是简单地割去那些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有缺陷的土壤上长出的恐怖主义毒芽，而是铲除它们产生和生长的根基。

我们在正当的激愤的爆发中，在向自己发出与国际和地区恐怖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誓言时，还是要清醒地和清楚地回答下列问题：我们实际上应该与谁，甚至与什么进行斗争；我们应该怎样根除这个世界性的“灾祸”。

只有在客观地和正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会忘记这些可怕的词——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

现在人类已经感受到和意识到危险，可以在贫富之间决裂的道路上，在“爱好和平”的富人和“侵略性的”穷人间决裂的道路上，做出十分具体有力的行动。只要无一例外地给所有国家带来死亡和破坏，就必须这样。

这样就自然地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为在全世界缓和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有关的紧张局势，走出第一步的代价是多少？为此采取非常人所能忍受的力量的集中和过激的行动是必须的吗？

只举一个虽非最有说服力的，但却是很明显的例子。

十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向联合国成员国提出了一个从实质和精神来说都很简要的建议：让我们共同努力，迈出善意的一步，从所有国家的军事预算中拿出百分之一，来解决危机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这样做，可以缓解矛盾，并可能避免一系列矛盾和危机状态的产生。在当时，全球化的急速步伐和平和的“极端的”不稳定都说明了正在来临的风暴及其表现和后果。但正像哈萨克人说的：“当听到危机的脚步声时——人

就装聋作哑，当出现危机的阴影时——人就变成瞎子。”

关于有益的相互妥协的呼吁无人听从。

是不是这个建议提的不是时候？有可能。

是否这个建议提得毫无根据？看来不是。

当时，大家正处于苏联极权制度崩溃的兴奋之中，又被下述希望所困惑，即人类可能在自由主义原则上实行全球团结。大家都感到：达到这一点已经没有障碍，并天真地认为，什么都会水到渠成。既然现在所有国家都会减少武装开支，因为对武装已经没有像过去在两个“大兄弟”的竞争时那样急迫地需求，为什么还要焦躁不安。

十年过去了，正像我们喜欢讲的那样：世界改变了。“……在这个论坛上，我想重复整整十年前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建议——关于所有国家削减军事预算百分之一用于发展最贫穷的国家”——这些话是我不久前——2002年9月，即2001年“9·11”悲剧之后约一年，在约翰内斯堡的高峰会议上说的。

在确定世界变化时，我们应该指出并说明变化的究竟是什么？遗憾的是，在对美国的悲剧发生前后的事件进行准确追踪并将其与此时的世界状况进行对比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什么也没有变，或者几乎什么也没有变。

一方面，这样的事实有利于说明世界的变化，如阿富汗“塔利班”体制的更换和世界各国反恐活动的加强，但恐怖主义并未因“塔利班”的倒台而被根除。

不难发现，在人类历史上，像这样规模的事件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但在这些事件之后，谁也不能断定世界发生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全球性的变化。

更甚于此……

地球上的困苦与贫穷减少了吗？没有！

治疗精神病的药物生产和它们的应用减少了吗？没有！

主流宗教信仰之间的侵略性和不宽容减少了吗？没有！

如此等等……没有！没有！还是没有！

那么巴厘岛上的血腥恐怖事件和莫斯科挟持人质事件呢？

主要的恐怖组织“基地”至今仍然存在。我们并不确切知道“第一号国际恐怖分子”乌萨马·本·拉登是死是活，——但正像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前那样，他的看不见的存在到处可以感觉到。

这点在生活的细节上都可以感觉出来。据说，主要的航空公司在服务顾客时又开始提供金属刀叉。航空乘客又重新大量增加，而无数的安全措施已无法监控，更谈不上保证飞行时的绝对安全。

危险过去了，人们仿佛重又盲目乐观了。

生活并未停止不前。今天有迹象表明，在那惊慌的岁月支配我们的预见性、有意识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氛围，又重新让位给疏忽大意、不理解和不信任。

为了战胜危险，就不应该忘记它和逃避它。必须向它迎面走去，用集体的力量与它斗争；必须丢弃地缘政治的利己打算、宗教间的偏见和政治野心，尤其是当这些是我们地球的慢性病时更应如此。因为它们会发展成恐怖主义，而且经常是它的最为特殊的侵略形式。

我们宣告：为了全面的安全，强者的权利应该为国际的集体权利所替代。在形式上，我们可以说，国家间的关系基本上遵循的是国际法。在很多情况下事实也是如此。诉诸国际法成了许多国家的传统和“和平的”武器。国际法的威信是很高的。它也为国际法诞生、自我确定和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无条件承认的明白无误的历史所证实。

1648 年。被多年的残酷战争弄得疲惫不堪和被隔绝的欧洲渴望和平。但这不只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和平，而是可以成为以重大保证和建设为基础的、制止新的战争和冲突的有效手段的和平。最终，交战国在位于威斯特法

利亚的蒙斯特的哥特式教堂和奥斯那布留克的市政厅签署了久待的和约。宗教的利益让位于国家的利益。这样就诞生了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它使欧洲得以生存下去，并提供了未来的安全。和约的基础是“主权”和“民族利益”这些新概念。

新的世界秩序诞生了——取代不可避免的封建和宗教的内讧式战争，出现了建立在自治权和主权基础上的国家间的和平协议。由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奠定的新体制发展成为一种改革。它最终会向世界提供一个进步的和目标坚定的联合起来的欧洲。除了个别的例外，建立在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基础上的欧洲安全体制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它最后的崩溃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9年。建立在1648年和约上的欧洲安全体制在拿破伦征战危机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完全寿终正寝了。边界的不可侵犯原则和主权的不可动摇性已经不能保证和平，也不能或多或少地成为防止战争的真正手段。需要更加有力可靠的保证，以使世界大战的烽火不再燃起。更甚于此，有一种新的危险——共产主义的威胁从东方在向欧洲接近。苏维埃俄国原则上不承认以边界的不可破坏性和民族利益为基础的欧洲的世界秩序。苏俄公开宣传不承认边界和主权的世界革命。6月28日，在凡尔赛，在法国国王的府邸，协约国各国和德国签署了协议。它以所谓有关战后世界结构的凡尔赛体制的形式确定了地缘政治游戏的新规则。其中，凡尔赛向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发明——“和平保证者”概念。至此，和平不再是建立在过去的民族主权的原则上，而是以和平的集体保证者为避免出现潜在侵略者为基石。这个保证者就是协约国。

根据这个和平新体制组织者的想法，只有使可能的战争策划者感到恐惧才能保证和平。凡尔赛世界体制的第一个裂口是苏维埃俄国打开的。它成功地与协约国对立，并发展成强大的苏联，继续宣传世界革命思想。凡尔赛世界受到的最后打击来自德国的复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它们导致了欧洲和其

他地区地图的改变。凡尔赛安全体制遭到的如此惨重的失败也导致了“欧洲中心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中心主义”……

1945年的雅尔塔世界体制建立了长期的地缘政治势力均衡，到1991年才崩溃……

2001年。所谓的“不对称的”战争震惊了世界。战争发生在没有正规军的、超地域的组织和具有一切国家属性的世界强国之间，“基地组织”与美国之间。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势力——国际恐怖主义以最骇人听闻的和残酷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存在。地球上的人们第一次感觉到：这种敌人，他带来死亡和破坏，而从事这种罪恶可以无所顾忌；他不承认国际法，国家边界不会阻止他或使他谨慎些，他不怕“和平的保证者”，不管这些人有多强大。恐怖主义这个恶魔一直存在，并一直对它的敌人进行背信弃义的打击。但如此公开和如此大规模的打击却从未有过。美国甚至在与拥有很高军事潜力和训练有素的军队的伊拉克的战争中，在“沙漠风暴”期间，损失的人员也比在与单个的超地域的“基地组织”（尽管是国际范围的）的战争中要少得多。

国际恐怖主义沉重地打击了至今存在过的和还存在的全球性的和地区性的安全体制。而尚未从第一次震荡中恢复过来的世界，至今还没有相应的安全体制和新的世界秩序的构建来应对新的威胁。

不管怎样，不论是全球的或地区的安全，并没有增多或减少。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安全并没有增多；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危险并没有减少；就像在两大体系“冷战”对抗消失后安全并没有增多；就像在2001年9月11日“不对称战争”后危险并没有减少。

如果说世界秩序体制的变化，应该指出，对全球的、地区的和国家的安全的威胁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有了新的性质和不同的规模。在稳定与不稳定之间，在组织性和混乱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已经完全不同了，并且具有新的特质。

但我们还要再一次十分明确地指出，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至多只是人类那些隐蔽的病症的表面现象。这种病不是那种可以单个治疗的疾病，而是需要由所有国家和共同体进行集体会诊的。更甚于此，它要求一些国家做出一定的牺牲，要求另一些国家的善意与和解。只有在“富裕的”和“贫困的”世界之间达成双边妥协的情况下，只有在过度的生产考虑自然的因素（严重受害的自然已起而“反抗”并影响到所有方面）的情况下，只有在采取集体努力以消除侵略和武装冲突的真正原因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谈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和根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今天一种时髦的说法是把里海和中亚说成是“第二个巴尔干”。而且，几乎已把这说成是事实。但我认为，这里不需要把形势戏剧化，或者追求廉价的轰动效应。

让我们看一看中亚地区国家独立后短暂的发展历史。虽然在“庆祝主权的游行”之后这段时间充满混乱，虽然在国际方面缺乏调解事端的实践经验，但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例子。它们表明国家和社会为了稳定和和平所做的外交工作极大地促进并提高了这个地区的安全。

中亚调解事端的潜力是很大的，足以使事端不会走向极端。虽然有不少危机局势，但我们完全有权断言，我们民族占优势的是热爱和平的意愿和没有侵略的本性。甚至在爆发了内战的塔吉克斯坦，自发势力只有用社会条约——社会内部的和平调解过程来克制。这也涉及如此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如独联体国家间的边界问题，这些问题在苏联解体后好像突出起来。事实终究是事实，在世界许多地区，正是这个边界问题导致了悲惨的结局，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很多。在哈萨克斯坦，划定边界的过程完全是和平的，是以正式的程序和外交谈判为基础的。

哈萨克斯坦——独联体和中亚中为数不多的并没有经历内战的灾祸或社会无序的混乱国家之一。我们并没有遭遇恐怖势力、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

我们没有遭遇在获得国家独立后的不安定期所预示的所有灾难。

我们将自己所有的问题，内部的和外部的，都用完全和平的和非暴力的途径解决了。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在条约的和信任的基础上建立彼此的关系的话，国家之间永远可以找到接触点。如果“枪炮的语言”真是政策的继续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最初的政策本身的构造是不完善的，并且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原则上的。如果政策的基础是对和平和调解事端的真诚愿望，那么它的结果必然也与开始时的愿望一致。

对这点的无可争议的证据是：哈萨克斯坦多年来为和平解决冲突所做的努力和在阿拉木图举行的第一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高峰会议。这个会议联合了亚欧国家并已成为我们地区最大的调解事端的论坛。

我们民族反对侵略意愿的最近一个证据是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边界划定条约的签订。要知道，还在不久前，世界媒体和地区媒体还在大谈这个带有极其危险的冲突性的“障碍物”，甚至说是这种危险可达到国家间的对立。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冲突完全是由和平的途径解决的。而且只有这个途径才解除了在里海地区和中亚地区国家间的并非最后的其他障碍物。我希望，将来只用这种途径来解除国家间和社会间的所剩下的所有欲望和冲突。我们地区许多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宽容的态度对处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和冲突局势是有代表性的。

毫无疑问，我有足够的根据来怀疑“第二个巴尔干”理论的正确性。这里不存在自我安慰和凭空臆想。

对我们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威胁有很多，它们的性质没有变化。但我像过去一样认为，只有建立在相互妥协和信任基础上的调解事端的政策才能够在继续巩固和平秩序的事业中成为发挥作用的和有效的手段。哈萨克斯坦这些年来就一直奉行这种和平秩序，今后也会这样。

目 录

火的记忆（序言）	（ 1 ）
第一章 恐惧的帝国和恐怖的辞藻	（ 1 ）
第二章 宗教里没有极端主义	（22）
第三章 受到特别关注的地区	（39）
第四章 千年沧桑话里海	（54）
第五章 安全之路	（66）
结束语	（90）